

吴小庆 吴旭峰
尹彦 尹松 编

吴强

文集

第三卷
散文·评论卷

吴强（1918—2000），原名吴永成，江苏宜兴人。1935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40年任《解放日报》编辑。1942年任《解放日报》文艺组组长。1945年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1949年任《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1950年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1951年任《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1952年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1953年任《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1954年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1955年任《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1956年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1957年任《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1958年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1959年任《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1960年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1961年任《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1962年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1963年任《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1964年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1965年任《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1966年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1967年任《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1968年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1969年任《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1970年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1971年任《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1972年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1973年任《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1974年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1975年任《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1976年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1977年任《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1978年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1979年任《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1980年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1981年任《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1982年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1983年任《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1984年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1985年任《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1986年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1987年任《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1988年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1989年任《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1990年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1991年任《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1992年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1993年任《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1994年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1995年任《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1996年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1997年任《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1998年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1999年任《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2000年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

吴小庆 吴旭峰
尹彦 尹松 编

吴强

文集

第③卷

散文·评论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强文集. 第3卷/吴小庆等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5321-3956-9

I. ①吴… II. ①吴…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③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④文学评论-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8189 号

责任编辑: 李 霞

封面设计: 王志伟

吴强文集 第3卷

吴小庆等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7 插页 2 字数 426,000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3956-9/I·3049 定价: 185.00元(共三卷)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吴强，摄于1935年



在美国巴尔地摩港口，摄于1990年2月
17日八十寿辰

我的回顾(代序)

三十年过去了。

其中的十年多，被林彪和“四人帮”侵占剥夺了去。在剩下的二十年里，我做了一些工作，写了几篇作品，成绩是微不足道的。回顾起来，却颇有一些痛切的感受。现在，只就有关创作问题的，谈下面两点：

我走上文学道路，从事写作，是偶然的，也是摸索着走的。一九三五年秋天，我发表在《太白》上第一篇作品，是三千多字的人物特写，叫《电报杆》。写的是我的一个相熟的人，他喜欢在市镇上东走西颠，传播新闻，大家给他起个绰号“电报杆”。我觉得这个人的形象有明显地给人以一种滑稽感的特点，便写了他。以后，我便以此作为心得，循着这个路子，以自己熟悉的人和事情，作为写作对象，写了几个短篇小说、散文。在摸索、学习写作的过程中，从别人的、前人的作品里，从一些文学评论里，又领悟到这原是一条无疑的、不可改变、不可违反的法则。建国以后，我在一九五三、五四年写的两个中篇小说《他高高举起雪亮的小马枪》和《养马的人》，一九五六年写的长篇小说《红日》，都是以我所熟悉的革命战争生活和人物作为题材和描写对象的。

但是，我也违反过这条经过我的实践检验了的无疑的法则，写了自己不熟悉的东西，在创作上遭得失败。那是一九五八年的事。当时来了个“大跃进”，上面发出号召：作家要下工厂、农村，迅速反映当前的斗争生活，“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服务”……我便下了工厂，“深入”生活。下去不到一个月，便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叫《热

浪奔腾》，不到三个月，又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和一个电影文学剧本。我的实践说明，那篇报告，对当时的“热浪奔腾”的生活，确实作了迅速的及时的反映，但却仅仅是一篇应时应景的东西；那个短篇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则不可避免地成了干巴巴的废品。一九五八年那一段写作生活，给我的教训是痛苦的，因为我干了明知故犯的事，违反了经过我自己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文学创作上的一条基本常识，也是一条法则：写自己熟悉的生活。

我认为写自己熟悉的生活题材，应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对当代作家的基本要求。“四人帮”不顾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把文学作为实现反革命阴谋的工具，在创作上尽搞无中生有、生编硬造，搞脱离生活的虚假文学、骗子文学、阴谋文学，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进行了十年大破坏，把文学创作引上邪路，推进了坟墓。在粉碎了“四人帮”将近三年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正在复苏、逐步前进的今天，竟还有人手里拿着大帽子，说要作家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就是“反对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是不要作家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而是要作家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也就是去无中生有、生编硬造吗？或者，又是要作家放下他自己熟悉的生活题材不写，到工农兵当中去生活，在短暂的时间内，在作家对生活和生活的人物还不熟悉的时候，就“赶任务”，写那种无血无肉的他自己既不感动也不感动人的作品吗？一九六三年四月，在一次中宣部召开的会议上，张春桥大讲“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回到上海，就把好些作家赶了下去。当时，我只得把正在写作中的长篇小说《堡垒》搁置下来，去搞了两年“四清”，结果，关于“十三年”，我只写了一篇六千多字的报告文学《陈永康在常熟》，此外，什么也没有写，也写不出。写我所熟悉的抗日战争题材的《堡垒》却一搁就搁了十五六年，直到两个月之前，才将它的上部续写完成。我的这个创作遭遇，在作家要不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题材问题上，不也是一个舍熟就生、得不偿失的例子吗？

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的上述教训和“大写十三年”口

号下的我的创作遭遇，今天回想起来，心中还是感到痛苦、懊恼。领导者当然要按艺术规律办事，尊重作家自己的意志，让作家写他自己熟悉的生活题材，或者给作家以必不可少的条件去熟悉他要熟悉的东西，待他熟悉了或者比较熟悉了的时候再写，务必不要分配任务，勉强作家去写他所不熟悉的东西，“赶任务”，搞“急就章”。作家本人则不论在怎样的情况下，对单凭“长官意志”的瞎指挥，都要加以抵制。在创作上，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题材。不熟悉的坚决不写，到熟悉了或者比较熟悉了的时候再写。政治上的原则要坚持；艺术上的原则，譬如按照艺术规律和创作规律办事，也要坚持，是不能放弃和违反的。

文学是写人的，“文学就是人学”，人物写得好坏，是作品成败的基本标志。这是为古今中外作家的实践和他们的作品证明了的，这也是文学创作的一条规律、法则，必须遵循，不能违反。在这个写人物的问题上，我在创作实践中，也有过惶惑和苦恼。

我根据我所经历的实际生活和我所接触、了解的各种真实的人物，在长篇小说《红日》中，我写了几种类型的革命队伍中的英雄人物。班长（后来是排长）杨军、战士（后来是班长）张华峰是一种类型，他们纯朴、和善、勇敢、沉毅，是战士们的榜样、表率；战士（后来是班长）秦守本是一种类型，他也性格纯朴，作战勇敢，但与杨军、张华峰比较，显得头脑简单，态度生硬，经过战斗生活的锻炼、教育，却也有所改变；在干部中，我写了这样一种类型：有胆有识，指挥果断，但有时显得莽撞、暴躁，因而在作战中犯了错误，经过领导和群众的批评，也能迅速纠正，如连长石东根。另一种类型是军长沈振新、副军长梁波。他们两个人的性格、作风有所不同，但具有相同的气质、品格特征：在大兵团作战中，重任在肩。当局势艰险危急的时刻，沉着、坚定、果敢、不苟不乱，从容指挥作战，克敌制胜……建国以后的三十年来，在创作上，关于塑造英雄人物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争论之一，是写英雄人物能不能写缺点。在“四人帮”统治的年代，他们定了一条清规戒律：写英雄不准

写缺点。他们说英雄人物是完美无缺的。他们不顾人间的生活实况，把人化为神，化为现实生活中全不存在的无处寻觅的神人仙女。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多种多样的，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也是多种多样的。武松是英雄人物，李逵也是英雄人物，赵云是英雄人物，张飞也是英雄人物，诸葛亮、周瑜也是英雄人物。不能只承认武松、赵云、诸葛亮，而不承认李逵、张飞、周瑜是英雄人物。杨军、张华峰是英雄人物，沈振新、梁波是英雄人物，石东根也是英雄人物。杨军、张华峰、沈振新、梁波在《红日》里所表现的战斗生活过程中，显露的缺点较少，彼此又是各不相同的人物；而石东根则是由于他自身的内在条件，在一定的情境之下，显露了他是缺点较为突出的人物。由于他们各自不同的内在条件和所处的不同的情境，因而有互不相同的表现，是自然的。但是，他们在对敌作战中，都很勇敢、坚定、顽强，不怕艰难困苦，为歼灭敌人、夺取胜利而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他们都是革命的英雄人物，是无可争辩的。记得《红日》于一九五七年七月问世不久，我就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向我提出责问说：“难道人民解放军的连长，像石东根那样吗？”之后，还有人指责我丑化了人民解放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是从建国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发生之前的十七年中，写英雄人物可不可以写缺点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实际上，认为不可以写缺点的论点，占着优势。现在，粉碎了“四人帮”将近三年，却还有人认为既然是英雄人物，就不能有缺点。《红日》电影中石东根醉酒纵马的一段情节，不就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对作家作品落实政策的时候，被剪掉了吗？“文化大革命”以前允许存在的，“四人帮”法西斯统治时期不允许存在，当然毫不奇怪，为什么“四人帮”倒台之后的今天，也不允许存在呢？有一种议论说，写英雄人物是可以忽略人物的缺点的。文学艺术塑造人物形象，原就不是生活原型的照相，而是允许、必须在原型的基础上进行艺术的概括、集中、提高，使之从生活真实达到艺术真实，更典型化。这是文学创作上的常识。但不能从而认为写英雄人物就是不能写他的任何缺点，不能写他的成长过程中被认为

是缺点的表现。这个论点是不正确的，是把原是多种多样的英雄人物理想化、单一化。既违反了生活的真实，也违反了艺术的真实，也就远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原则。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里，我发表了一个三千多字的短篇小说《一只鸭子》。小说写的一个主要人物叫胡大嫂，她是个只顾私不顾公的农业合作社社员，田不种，水不车，为了一只鸭子被小孩子扔石子误打致死，诬赖其他的人踢死了她的鸭子，因而争吵起来。后来，弄明了事实真相，又经过合作社主任和她的丈夫苦说了半夜，她认识到自己的错处，向被她诬赖、同她争吵的人道了歉，送去烧熟的一碗鸭肉，而且在第二天中午，就到公田里去参加车水了。一九六三年，我将这篇文章收进散文小说集，却被一家出版社的编辑部认为写的是“中间人物”，抽了下来。一九五七年，我发表的短篇小说《海边》，写的一个主要人物叫王老海，他是民兵小队长。一次，大队长给他一个镇压一名汉奸的任务，他害怕汉奸死后的鬼魂对他报复，不敢亲手杀死这个敌人，后来，经过大队长和民兵们的批评，又得知这个汉奸曾经把他和他老婆的名字，都列到捕杀的名单里，送给了日本鬼子，他便下了决心，执行了大队长给他的任务。也因为写的“中间人物”，被抽了下来，不让收到散文小说集里去；一九六二年反修批判中，曾被作为修正主义文学作品，进行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被斥为“丑化劳动人民”的标本。前面说过，生活中的人，是多种多样的，生活中有什么人物，就可以写什么人物，作家写作品，在作品中写人物，是根据他的生活经历进行选择和艺术塑造的。他熟悉什么人物，要写什么人物，就应当允许他写什么人物，而不应当强制他只能写这种人物，不能写那种人物；也不能说写英雄人物重要，写非英雄人物就不重要，认为各个阶级都要塑造各个阶级的英雄人物，便要求每个无产阶级作家，都去写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都去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除此以外的其他人物，则一概不准作为写作的主要对象即作品的主人公；这也势必会把作家赶到一条狭窄的胡同里去，使文学作品单一化。文学是通过作品的生动形象，去影响人们的

思想、情感的。这种影响也应从多方面来，从多方面给人们以影响，去教育人、感动人。董存瑞、刘胡兰、朱老忠等等人物形象，可以使人们感奋，对人们的精神世界发生积极的作用，阿Q、梁三老汉等人物的形象，不是也能从另一方面发人深省吗？《白毛女》中的喜儿不是英雄人物，也不是中间人物，塑造了她在遭受迫害、苦难中挣扎、反抗，终于得到拯救、解放的形象，不是也能使人深受感动吗？这两年来，在被一些人贬为“伤痕文学”和“暴露文学”的一些作品中，如刘心武在《班主任》中塑造的谢惠敏的形象，冯骥才在《铺花的歧路》中塑造的白慧的形象，是在六十年代中期的大风暴中，灵魂深处受到林彪和“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和极左思潮的毒害，因而走上思想、生活的歧路。作家写的这样两个精神上受了严重创伤的人物形象，对读者们，尤其对广大的青年的影响，是异常深刻的。

三十年波澜起伏的文艺生活和文学创作的进程，带给我们的教训告诉我们，要达到真正的文学创作繁荣、百花齐放的境界，就得尊重、按照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给予作家以自由广阔的天地，让他们写自己熟悉的生活题材，让他们根据实际生活，塑造出各色各样的感人的、人物形象来，而不要再给他们以这样那样的约束、限制，提出这样那样根本达不到的要求，使他们再陷入苦恼的泥潭里。

一九七九年九月一日

——原载《文艺报》1979年第10期

目 录

我的回顾（代序）	1
----------------	---

散文·报告文学

活跃在江南敌区的新四军	3
史沫特莱在皖南	9
异样的军队	14
大捷迎春	
——纪念淮海战役十周年	24
渡江第一船	
——纪念渡江战役十周年	29
访董家妈妈	39
夏日黄昏	49
开学	54
江心洲夏景	66
我的戒烟	77
醉话	90
小年夜	100
《印象·感想·回忆》读后	113
可喜的新花	
——谈短篇小说《伤痕》	116

夜读《傅雷家书》	120
读惠文有感	125
读陈祖德《超越自我》	128
卡曾斯和他的《人的选择》	131
洛杉矶散记	134
谒哈顿村纪念碑 ——访苏散记	145
迎接八十年代第一春	149
上海的春天	151
今日的上海港	154
祝愿你，淮海路！	158
雨中访滨海古园	161
滨海艳阳秋	163

回忆·纪念

春天的哀思	171
怀念陈总 ——回忆陈毅同志对部队文化工作的亲切关怀	180
文艺需要大胆地创作 ——追忆陈毅同志的几次谈话	188
元帅谈创作	195
追忆、怀念粟裕将军	201
缅怀省长、作家惠浴宇	232
他们并排坐着	248
新四军文艺活动回忆	254

一部话剧的小史

——追忆《丁赞亭》的创作和演出····· 275

虎穴对话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一次特殊的战斗····· 281

回忆我的孩子时代····· 295

怀念海青哥哥····· 319

“一六惨案”回忆····· 330

左联半年生活回忆····· 345

深深的怀念····· 350

开封两年杂忆····· 354

武汉！怀念你！祝福你！····· 359

回乡杂记····· 363

故乡，祝福你····· 376

悼少白····· 381

悼念茅公····· 384

感怀望道先生····· 387

悼念钟望阳同志····· 392

悼念冯岗····· 395

缅怀以群和傅雷····· 397

悼念平羽同志····· 400

悼念萧岱同志····· 403

怀念白音

——兼忆《红日》电影改编过程····· 405

杂文·评论

奇怪的禁烟政策····· 411

我们的生路····· 412

老实话·····	414
欢迎文艺生活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416
谈拆“墙”·····	422
我的第一位的工作·····	426
运用形象思维的一点体会	
——写在《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	
以后·····	432
关于“棍子”和“长官”之类·····	436
庐山半月·····	439
我自己和《苦脸》·····	447
关于我的第一篇小说·····	448
第一步	
——谈我的处女作《电报杆》·····	454
《前线记事》的记事·····	457
写作《红日》的情况和一些体会·····	462
谈《红日》的创作体会·····	484
我为什么写《黄桥决战》·····	493
《堡垒》后记·····	498
我是怎样写作的·····	501

附 录

吴强主要著作文章索引·····	507
编后记·····	528

散文·报告文学

